

广州南方图书公司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组编

容庚

选集

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选集丛书

東莞容庚選集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容庚选集

曾宪通 编选

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选集丛书

出 版 说 明

为了系统地搜集和整理“五四”以来我国著名社会科学家
的代表性著作，向广大读者介绍现代社会科学家在各个学术领
域方面的成就，以推动当代社会科学的研究和发展，特编辑出
版《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选集丛书》。

本丛书的编选原则是：

一、列选的社会科学家，要求是我国现代社会科学各学科
或专业的奠基者，开拓者，或是在学术理论研究方面有创见、成
就卓著的知名人士。

二、丛书所选收的社会科学家的著作，要求尽可能体现其
生平学术成就和学术思想、系有代表性的著作。对其长篇论著
一般只节选其中的主要篇章。

三、本丛书初步拟定为五十种。每位社会科学家各编选一
集，每集约三十万字。

书中有介绍本选集内容及特点的前言，以及对作者的生平、
学术活动、学术思想和学术成就进行综合评价的述评或序。

本丛书是由中国南方图书公司和天津人民出版社共同组稿
编辑的。

由于编辑水平有限，恳切希望得到各方面人士和广大读者的支持和帮助，为积累文化、传播科学理论做出贡献。

编者前言

容庚先生原名容肇庚，字希白，号颂斋，广东省东莞城人。生于1894年9月5日，1983年3月6日逝世，终年九十岁。先生少年即醉心于金石之学，壮而弥笃，由文字而及器物，更进而及于史迹。毕生著书二十余种，论文及其它述作近百篇。是我国著名的古文字学家、考古学家、书法篆刻家和收藏家。

1949年春，先生将平生所为文字结集成书名为《颂斋述林》。杨树达先生为之作《序》云：

君少问学于舅氏邓尔雅，继而北游，北方为人文渊藪，君因得奉手于通人王静安、罗叔言、沈兼士诸君。由是闻见日扩，学亦益进，博涉书史，于甲骨、彝器、书画、摹印之业无所不通。著书若干编，累数十百万言，流传海内外，海内外学者莫不重之。立言矜慎不苟，于其所未达，丘盖不言。凡缪悠之谈，怪奇之说，于君所著书中穷搜力索，决无由得其踪影。其示学者之言曰：“古文字之学，纂录其文，考释其义，参证于经史，乃为尽之。”其持论之正，见道之笃如此，宜君之成就卓卓，非等辈所敢望也。

1965年《颂斋述林》录成，稿交北京中华书局排印。‘文革’前夕，先生将书稿索回。‘文革’中书稿散佚殆尽，幸存有篇目及部分抄件。本集即据先生手定之《颂斋述林》篇目稍加损益编次而成。此书字数，虽不及先生全部著作的二十分之一，然皆具有一定的代表性，读者可以从中一睹先生治学的风貌。

本选集分上下两编。上编收“专论”十种，下编收序跋及其它“杂文”三十八篇。专论《宋代吉金书籍述评》及《清代吉金书籍述评》对宋、清两代铜器铭文的著作作全面系统的论述和评价，是我国金石学的权威性总结。《周金文中所见代名词释例》比较金文代名词与典籍用法的异同，为利用古文字资料研究上古汉语开一创例。《鸟书考》与《飞白考》分别考述我国书史上两种特殊而罕见的书体，是列国金文和书法研究中别具一格的佳作。《秦始皇刻石考》详细论述秦始皇刻石的原起、刻石的形状和存佚，刻辞的内容以及版本的流传等，至今仍是研究秦代刻石最为详备的著作。《记竹谱十四种》集录先生所见自元至清之竹谱十四种，比较其异同得失，详加论列，以为初学者示范。《澄清堂帖》由于摹刻精良，一向备受推崇，旧以为南唐李后主所刻。《澄清堂帖考》据先生亲见之宋拓及部分翻刻本，博综前贤所论，益以新知，考定此帖为南宋嘉定所刻。《论列朝诗集与明诗综》详考明代两部大型诗集的撰集经过，综论前人对二书的评说，全面比较诗集与诗综的异同与优劣，得出“《明诗综》固不敌《列朝诗集》”的结论。引证详博，抉择有方，令人叹服。下编收先生为自己及他人著作所写的序跋多篇，保存着不少难得的背景材料，有的还可以作为进一步学习的响导，弥足珍贵。文史杂论夹议夹叙，富可读性，其中不乏精辟独到的见解，令人回味无穷。总之，本集所收虽

然篇幅有限，但它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先生在广阔学术领域里的执着追求，是先生辛勤耕耘和锐意创新的实录，人们可以从了解先生的学术成就和学术思想，学习先生的治学经验和治学精神。笔者耿耿寸心，欲一本至诚将此书作为先生百年诞辰的献礼，籍以纪念在学术上作出创造性贡献的容庚先生。

曾宪通

1993.3

附记：在本书编选的过程中，中山大学图书馆古籍部曾晓霞同志协助搜集资料并编制《容庚先生著述年表》。谨此志之。

容庚先生学术贡献述评

曾宪通

容庚先生出身于晚清书宦世家，其高祖、曾祖分别是道光年间的贡生、举人；祖父鹤龄系同治恩科进士，外祖父邓蓉镜官至翰林，父亲为光绪丁酉科拔贡，世代皆习举子之业。（见《聊自娱斋诗稿跋》）但先人早逝，直接给他以亲炙的是四舅邓尔雅和从叔容祖椿。邓尔雅是广东有名的书法篆刻家；容祖椿工于绘画。先生从小就受到长辈学术和艺术的熏陶，这对他一生的治学影响极大。1913年，当他还在中学念书的时候，就已经对金石文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他在开始研习吴大澂《说文古籀补》和桂馥《缪篆分韵》时，即萌发补辑之意。1917年先生中学毕业，不复升学，与弟妹策划共同采集篆籀之见存者为《商周秦汉文字》一书，后因种种原因而未果。1922年，先生与三弟肇祖北上求学，路过天津，挟《金文编》稿本谒见了著名的考古学家罗振玉，深得罗的赏识，罗谓《金文编》正是他自己“欲做而未成者”，再三叮嘱“务竟其成”，并推荐他见北京大学马衡、沈兼士教授，遂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当研究生。1925年《金文编》书成，罗振玉、王国维、马衡、沈兼士、邓尔雅等前辈为之校订并序，初版由罗氏貽安堂印行。《金文编》是继《说文古籀补》之后在体列和编纂方法上有新突破的第一部金文大字典，由于它更加详备和矜慎，深得

学术界的推崇。1926年，先生毕业于北大研究所国学门，留北京大学任讲师。翌年转入燕京大学任襄教授。就在此时，广东大学以重金邀聘先生回广东任该校教授，燕大校长司徒雷登为了表示挽留，也越级擢升先生为燕大教授。先生鉴于学术研究的条件北方胜于南方，便决意继续留在燕大任教授，主编《燕京学报》，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才离去。先生这一决定在他的学术生涯中有着重要的意义。

容庚先生在北方工作的二十余年，是他在学术上从初露锋芒到大显身手的时期。他由文字入手而及器物，进而及于名物制度与史迹，对于商周青铜器及其铭文究治尤深，一跃而为斯学巨擘。这一时期，他除继续增订成名之作《金文编》外，还完成《金文编》的姐妹篇——《秦汉金文录》和《金文续编》的撰集工作，并开始系统整理历代金石书录，逐一加以品评，令其妹容媛辑成《金石书录目》一书。继而对宋清两代的金石图籍，作深入细致的梳理和校订工作，写成《宋代吉金书籍述评》及《西清金文真伪存佚考》等名篇。对于王国维、杨殿珣等人有关宋代金文著录和金石书目的著作，先生都一一加以检讨，并亲自校补或改编，使之更便于应用。通过对宋清两代金石学著作的校理和订正，先生对前人研究青铜器的成败得失已了然在胸，这就为他日后的研究工作打下了坚实而广博的基础。

从1927年起，先生兼任北平古物陈列所鉴定委员，因而有机会接触原器原铭，手自摩挲，辨伪经验日进。他有感于清代金文真伪杂糅给研究工作带来的严重后果，于是开始有选择地清理传世铜器，去伪存真，编制谱录。先生先后编印了《宝蕴楼彝器图录》（1929年）、《秦汉金文录》（1931年）、《颂斋

吉金图录》(1933年)、《武英殿彝器图录》(1934年)、《海外吉金图录》(1935年)、《善斋彝器图录》(1936年)等,总计达八百余器;都是从众多铜器中去伪存真、去粗存精地逐件筛选出来的。先生对于入选的商周青铜器甄选甚严,大抵以文字佳、花纹精、形状异及有裨于史者,或未经著录及虽已著录而流传未广者、或流失域外而罕为世人所知者入录。上述每种图录皆附有文字考释,除记述器之大小、花纹和形状之外,重点在于考证形制和释读题铭,凡器铭与古籍有关者,悉广为钩稽,为治古史者提供可靠的物证。对于某些具有特殊意义的论题,先生则别撰专文详加考述,如所作《殷周礼乐器考略》(1927年)、《汉代服御器考略》(1928年)、《颂壶考释》(1932年)、《晋侯平戎盘辨伪》(1937年)、《秦公钟簋之年代》(1937年)等。有的论题甚至一而再、再而三地不断增益和探究,如继1934年作《鸟书考》之后,1935年又作《鸟书考补正》,1938年复作《鸟书三考》加以补充,对金文中最难辨识的鸟虫书作了深入的探讨,创获良多。郭沫若在《越王钟考释》中指出:“旧于‘戊王’二字释为‘既望’,文例乖戾,因疑其伪。近时容庚始发明其读,知为越器。”(见《商周金文辞大系考释·补录》)。先生精于考古和鉴别,不但从传品中剔除出许多伪器,还从大批被误判为“疑”、“伪”的器物中,挽救出好些有价值的文物和资料,使它们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。

先生在精通古铜器书本材料与实物资料的基础上,更进而着眼于青铜器的整体研究,掌握其形制与铭辞的流变,观其会通。他以八年的时日,专事商周铜器的研究,昕夕耕耘,寝馈其中,终于在1941年完成了《商周彝器通考》这部开创性的巨著。全书分上下两编,上编“通论”,综论青铜器的基本理论

与基础知识，下编“各论”，按类系器，逐器辨析。于省吾先生称此书“条分件系，征引翔实，信可谓宏观巨制矣”。（见《商周彝器通考》于《序》）此部巨制是先生对宋清两代金石学的科学总结，并益以近代考古学的新成果而集其大成者，在中国青铜器的研究史上，有着划时代的意义。

在甲骨刻辞的研究方面，先生也有卓越的贡献。1929年，他为燕京大学购得徐坊所藏甲骨千二百片，先生选取其可信据者874片成《殷契卜辞》一书。书中有六十甲子大骨完善无缺，为他处所未见。又其第20片为祭祀刻辞，与王国维所考殷先公先王次序相合，可以互证。还发现卜辞有误字及习刻之例，其缺刻竖画者，更可推知卫人读“己亥”为“三豕”之由来。凡此种种，均可为卜辞研究多一参证。此外，先生在石刻画像、书画碑刻等方面也有精湛的研究；他在北大和燕大编印的教材如《金石学》、《甲骨文》及《中国文字学形义篇》等，也都有广泛的影响。1934年6月，先生与友人发起组织考古学社，并亲自编辑出版《考古学社社刊》，对当时的考古调查和研究直接起了推动的作用。这些都是十分难能可贵的。

抗战胜利后，先生接受李宗仁之聘往广西大学任教。由于当时广西大学校舍尚未建成，先生遂转入广东，任广州岭南大学教授兼中文系主任，主编《岭南学报》。新中国建立后，先生仍执教于岭南大学。1952年院系调整入中山大学，任中文系教授，直至逝世。

先生南归之后，于教学之余，仍继续从事古文字和古铜器的研究，著有《甲骨学概况》（1947年）、《殷周青铜器通论》（1958年）、《弭叔簋及匍簋考释的商榷》（1960年）、《清代吉金书籍述评》（1962年）等。与此同时，先生还对若干旧作加

以修订和补充，如第三、四版《金文编》（1959、1985年）、《宋代吉金书籍述评》（1963年）、《鸟书考》（1964年）等，都是在旧作的基础上踵事增华而成的。先生早年曾跟从叔祖椿和从兄康泰习画，又与舅氏汝霖和表兄懋勋一道品评字画，遍观二家所藏画谱书录，对于书画原有很大的兴趣，间也有所述作。因有感于列子“大道以多歧亡羊，学者以多方丧生”的话，故于金石之外，不敢多所旁鹜。回岭南后，由于南方金石彝器求之不易，甚至连求一拓墨之人亦不可得，苦无用武之地。于是，先生的研究兴趣便逐渐转移到书画碑帖方面来。这一时期有关书画碑帖的著作主要有：《记竹谱十四种》（1947年）、《倪瓒画之著录及其伪作》（1948年）、《飞白考》（1949年）、《颂斋书画小记》（1950年）、《淳化秘阁法帖考》（1952年）、《澄清堂帖考》（1961年）、《略评书画书录解题》等。六十年代以后，先生更把主要精力集中到《丛帖目》、《历代名画著录目》和《颂斋所藏所见书画小记》这三部大型工具书的辑述上来，即使在十年动乱身处逆境之中也从未间断过。除《丛帖目》二十卷已由中华书局香港分局出版外，余二种约二百多万字尚待刊行。

综观先生一生所走的学术道路，谨略举数事，以管窥先生治学的方法及其基本特征。

一曰以目录为治学之阶梯 先生认为，做学问的人为了研究某一专题，只靠平日博闻强记是不够的，必须借助“目录”一类的工具书，才能综观全局，逐步达致学术的顶点。先生少时自学《说文》，即得力于黎永椿的《说文通检》。其后研治金文，又获益于王国维的《宋代金文著录表》和《国朝金文著录表》二书。但先生于目录书籍并不限于使用，而是在使用中善

于发现问题，加以校补和订正。先生既校补了杨殿珣的《宋代金石书考目》和《宋代金石佚书目》，又改编了王国维的《宋代金文著录表》，使这些不可须臾离的案头书更臻完善。又自编《三代秦汉金文著录表》，成为后来辑集金文著录的蓝本。先生对于他人的研究成果，总是审慎地加以分析和甄别，凡评鹭书中得失，务必力求准确和客观，惟恐“稍一不当，施之古人则损余德，施之今人则贾人怨”。故始终抱着高度负责的态度。先生写过不少书评，如《评金石书目四种》（1929年）、《评猷氏集古录》（1930年）、《略评书画书录解题》等，都是持论允当而中肯的。《宋代吉金书籍述评》和《清代吉金书籍述评》二种，则是先生在这方面的代表作。不仅如此，先生更熔目录与学术于一炉，辑成专书，除属八妹容媛成《金石书录目》和自编《三代秦汉金文著录表》外，先生晚年完成的《颂斋丛帖目》和《历代名画著录目》二书，荦荦大观，洋洋二三百万言，则是帖画目录学的鸿篇巨制，其意义更远在目录索引之上的。

二曰以原始材料为治学之根本。先生谓治学最忌浮夸之言，无根之论；而要做到言之有物，就必须详细地占有第一手资料，作为研究的立足点。故先生始终以搜集原始材料为第一要务。早在二十年代中期，先生即倾心于辑集金石书录，每以薪酬之半购置金石图籍。南归时家藏图书近二百箱，号称“五千卷金石书室”。先生写有大量金石学研究的著作，正是取材于此的。1925年《金文编》初版印行，因当时所写定者仅上编殷周金文部分，其下编秦汉金文部分虽经三易其稿，仍感材料不足，于是先生决定先辑集《秦汉金文录》，以便为写定《金文续编》做好材料准备。先生在《秦汉金文录·序》中备

述搜集、鉴别、整理金文材料之难处，读之发人深省。尤其令人敬佩的是先生知难而进的精神。当先生任北平古物陈列所鉴定委员期间，与同仁七人负责鉴定由奉天、热河两行宫迁入之古铜器，当时时局瞬息多变，主其事与参与者动辄浮沉星散，鉴定工作常常被迫停顿。全赖先生独力坚持，不停地整理照片和纪录，并多方争取赞助与支持，终于编成并出版了《宝蕴楼彝器图录》和《武英殿彝器图录》二书，世人始得一睹清宫珍藏之铜器，而《武英殿彝器图录》更以摹拓花纹与铭文并重，开著录铜器花纹之先河。经过十余年的努力，由先生手编出版的铜器图录、画像录、书画录等不下十余种之多，构成先生著述的一大特色。唐兰先生在《颂斋吉金图录·序》中写道：“希白之为学，孜孜不息，故克于铜器之研究有巨量之贡献……且君不第研究而已矣，又致力于材料之搜集……书中取材之精，考古之家所必采矣。”众所周知，考古文物与古文字研究均需要丰富的实物资料作为新证的基础，材料越多，新证越富，旧说始可辨正，新说方得建立，学问由是得以扩展。二十年代末郭沫若在日本研究古文字，苦于资料匮乏，困难重重，以“未知友”的名义请先生援手。先生频频以珍贵资料远道见假，当时价值二百金的《殷虚书契前编》，一借就一整年，其它金文墨本更不计其数。郭氏著名的三部曲——《甲骨文字研究》、《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》和《两周金文辞大系》得以顺利成书，是同先生无私的援助分不开的。五十年代初期，传世法帖不为时尚，有用作爆竹原料者，先生视同拱壁，舟车南北，广为购求，共得二百二十余种，居国内公私藏家之冠。先生一百二十万字的《丛帖目》，主要是以自家的收藏为基础写成的。先生藏书以金石考古和书画丛帖最具特色，自成体系，正与先生之

治学互为表里。经先生辛勤罗集，精心鉴别和科学整理的原始材料，不但为先生自己的研究打下扎实的基础，也为并辈学人和后学者提供可靠翔实的素材，其对学术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。

三曰以考据为治学之手段 先生谓文字之学非同玄想，必须依靠大量的参考书，积累足够的证据，方能有所述作。先生对未识之字的考释，器物真伪的鉴别，历史年代的推断，皆据传世典籍和出土文献加以阐发和验证，做到言之有据，信而有征。如对鸟虫书“戊王”二字的释读（《鸟书考》），对西周金文真伪的判定（《西清金文真伪存佚表》），对晋侯平戎盘字体仿自散盘的论断（《晋侯平戎盘辨伪》），对倪瓒画真、疑、伪的厘订（《倪瓒画之著录及其伪作》）；以及推定秦公钟簋之作器者为桓公（《秦公钟簋之年代》），考定澄清堂法帖为南宋人之所刻（《澄清堂帖考》），至若论金文殷之与簋同字（《殷周礼乐器考略》），别簠斗之与尉斗异用（《汉代服御器考略》），等等，在在皆据文字以考定器物与人事，再据器物与人事以审核文字，近搜远讨，反复论证，然后才审慎地作出结论。至于《秦始皇刻石考》、《淳化秘阁法帖》与《飞白考》等，先生更充分地运用考据的手段，广为钩稽，互相抉发和证明。在《列朝诗集与明诗综》长文中，先生别开生面地采用考据法以治文学，文中论二书之异同与优劣，立论坚实，论证充分，言之凿凿，非一般以辞藻品评者所可比拟。先生对考据学的运用，态度特别严谨，他在《金文编·序》中写道：“吾闻之韩非子曰：‘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；非能必而据之者诬也。’著录彝器，审释文字，余惟愚与诬是惧。”今观先生为文考字，言必有据，据必参验，有所不知则付阙如，不敢掉以轻心。可见先生矜慎不

苟的严谨学风，是同他坚持以考据为研究学问的手段分不开的。

四曰以善通变为治学之目标。所谓“通变”，是指在融会贯通的基础上锐意创新。先生在谈及自己的治学经验时总是诙谐地说：“戏法人人有，巧妙自不同。”他强调读书、做学问首先要“精通”，尤其须“善变”。先生影响最大的《金文编》和《商周彝器通考》，便是善通变的成功之作。《金文编》是继清末吴大澂《说文古籀补》之后第一部大型金文字典。吴书收字尽据拓本，分别部居悉依《说文》，疑似不可识者则别为附录待问。这些优点，《金文编》都加以继承并发扬光大。但吴书有取材宠杂、取舍失当、疑信倒置，以及误解误释等缺点，《金文编》则一一为之匡误订正，蔚为大观。王国维称《金文编》“祖述中丞（吴大澂）而补正中丞书处甚多，是能用中丞之法而光大之者”。（见《金文编》王序）铜器方面，自宋以后太多着眼于铜器个体的研究，所著书籍，或只录图铭，或仅释文字，或间加考释，或阐发一端，均无以观其会通，缺乏一部能统观全局，汇通各种资料，反映这一学科的成就和发展变化的综合性著作。先生继《殷周礼乐器考略》之后，复以八年之力，完成《商周彝器通考》一书。此书首次突破宋清以来金石学的传统模式，从铭文、形制及花纹诸方面对商周铜器作综合研究，把辨伪、断代、释文、考证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。此书上下两编一十九章，总三十多万言。文内插图二百多幅，编末附图千余幅。是一部对古代铜器作系统理论阐发和科学分类的划时代著作。它的问世，标志着中国青铜器的研究已由旧式金石学迈进近代考古学的范畴。此书出版已逾半个世纪，至今还没有一部同类著作能够取代它。可以想见，如果先生没有对宋清两代的

铜器铭文著述作过详密的校读和深入的研究，如果没有对所有的铜器铭文资料作过仔细的辨正和科学的分析，是不可能在内容和形式上推陈出新而自成机杼的。先生既能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融会贯通，又善于根据学科的发展趋势而独辟蹊径，故能超越前人而独步古今。

以上四项，构成先生治学严谨、矜慎和赅博的特色。

先生常对学生说：“大匠予人以规矩而不能予人以巧，巧，只能在刻苦的磨炼中得来。”这就是先生注重实践和追求创新的至理名言。先生自己正是这样身体力行的：每天黎明即起，必伏案写作数小时，日日如是。他为自己立下的信条是：“人一能之己百之，人十能之己千之。果能此道，虽愚必明，虽柔必强。”（见《礼记·中庸》）。先生常谦虚地说自己本来只是个“中学生”，然而在七十年的学术生涯中，先生借助于目录学的阶梯而升堂入室，登上学术的宝殿；从一个中学生一跃而为出色的学者和著名的教授。个中奥妙，正是凭着他那“百之”“千之”，锲而不舍的精神，故能实现由愚到明，由柔到强的转化。

先生毕生献身于教育和学术事业，不但为国家培养了好几代古文字学和历史考古的专门人才，而且给人类留下了大量珍贵的精神财富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先生将自己珍藏的二百多件商周铜器，一千多幅历代书画和数万册古今图书陆续捐献给国家。这使后来者可以在前辈的基础上继续努力，推进事业的发展。先生早年尝引郑樵的话说：“学之不专者，为书之不明也；书之不明者，为类例之不分也。有专门之书，则有专门之学，有专门之学则有世守之能。人守其学，学守其书，书守其类；人有存没而学不息，世有变故而书不亡。”（见《金石书录目